

引言

我们伟大的祖国，地处亚洲东部，幅员辽阔，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历史悠久，从远古时代起，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埋藏着他们的遗骸和文化遗物。已有的材料足以证明，我国是人类起源和早期人类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我们的远古祖先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创造出丰富的原始文化。

人类的历史究竟有多长呢？目前尚难作出准确的回答，比较普遍地相信，人类创造的最早的文化大约在距今二百万年前。当时人还很原始，不懂得使用金属工具，只用石头打石头的方法，制成简单的工具，同时也用木质工具，辅以骨质工具。用这样的工具的时代很长，一直延续到大约距今一万年 before 结束。这个漫长的时代，在考古学上叫旧石器时代，这个时代的人所创造的文化就叫做旧石器文化。

旧石器时代相当于历史发展的原始社会的早期，占人类历史总长的 99.99% 以上。从人的体质演化上经历了猿人阶段、古人阶段和智人阶段；从文化发展上看，虽然是极其缓慢的，但毕竟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方向发展的，尽管整个旧石器时代都以打击石器作为其重要的时代标志，但是无论在选材、加工、工具类型以至于社会生活等方面都在变化中，而且变化的速度渐趋加速，终于在晚期发明了磨光技术、钻孔技术、同时还懂得了人工取火和营建住宅，为以后向更高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我国是旧石器文化丰富的国家。迄今所知，早在一百多

万年前，远古人类就已生存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主地上。我国不但有丰富的从猿到人过程中的古猿化石，而且还有各阶段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文化。旧石器时代分早、中和晚三个时期，大体与人类体质发展的猿人阶段、古人阶段和智人阶段相当。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和猿人化石已知分布于东经 $101^{\circ}55' - 124^{\circ}07'$ ，北纬 $25^{\circ}41' - 41^{\circ}15'$ 区域，在长江南北均有不少地点，其中有世界著名的远古文化宝库——中国猿人遗址；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和古人阶段的人化石的分布区域，在纬度上大体与早期的相同，在经度上明显地向西发展，即从东经 $104^{\circ}50'$ （也可能到东经 $87^{\circ}21'$ ）到 $119^{\circ}50'$ ，北纬 $24^{\circ}45' - 41^{\circ}15'$ ；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和化石智人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其分布区为东经 $81^{\circ}01' - 126^{\circ}42'$ ，北纬 $22^{\circ}40' - 53^{\circ}20'$ 。

原始人类是旧石器文化的创造者，是真正的无名英雄，他们的活动痕迹和自身虽已久埋荒野，即使最古的文字也不可能追述他们的业绩，但他们的历史功勋是永存的。他们艰苦劳动，同心协力，克服着为生存而斗争的种种困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身的体质也得到改造，推动着历史向前发展。他们这种顽强奋进的精神，在向“四化”进军的今天，在“两个文明”建设中仍是必不可少的。

研究旧石器文化的科学叫旧石器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旧石器考古工作者就是要通过辛勤细致地劳动，寻找远古人类的住址、石器制造场、墓葬、石器、骨器、角器、艺术品、装饰品以及其他的遗物和遗迹，通过研究，从这些废墟遗迹中寻找人类生存的条件和历史创造才能，进而阐明旧石器文化在时空上发生、发展的规律及其相互关系。

从上面的叙述，不难看出研究旧石器文化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而是有其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是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

“上帝造人”谬论的有力武器。大概在19世纪前期，即使法兰西科学院大多数院士也不相信有旧石器文化，人们普遍相信人类历史只有几千年，依当时仍然流行的厄色尔大主教（Archbishop Ussher）的年历，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是在公元前4004年；依照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日历，第一个人来到世界上是3月23日。在昔日，这似乎是无懈可击的，到今日，人们定会觉得是荒诞无稽，这不能不说与旧石器文化研究有关。史料业已证明，人类历史比宗教家杜撰的人类诞生的时间要早约五百倍呢！

旧石器文化资料是恢复原始社会早期历史的基本依据，是探讨氏族起源的重要资料。因为世界上有文字记载不过是几千年的事，而旧石器时代距今至少也有一万年了，所以，即使在最早的文字记载中也很难找到它的残迹。要复原这段人类历史，基本上靠地下发掘出来的文化资料。氏族的起源问题是研究原始社会的重要课题，虽然有些后进民族的资料可供参考，但至今已不能找到最早的完整的氏族形态，这就需要旧石器文化资料来加以阐明。例如旧石器时代晚期广泛发现以妇女为雕刻的题材，就使人相信，早在距今一至四万年间已存在母系氏族社会；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后期出现墓葬，表明当时人的亲属观念更强了，以血缘为纽带把人群维系得更紧了。这无疑是氏族存在的重要标志。

旧石器文化研究对一些学术问题的研究、对某些生产问题的解决都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例如现在大家都熟知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曾经历猿人、古人和智人三个阶段。而猿人阶段的确立还是由于中国猿人文化的发现！其来龙去脉，将在本书的第四章中详细地谈到。又如喜马拉雅山上升问题是新生代地质学家们所悉心研究的课题之一，近20年来，在西藏发现了一些旧石器地点，其中不少发现在今日称之为“无人区”的藏北，而且又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地点。这就表明，在几万年前藏北气候并不

象现在那样恶劣，由此可进而推测在更新世后喜马拉雅山曾有过加速上升的时期。建水库筑坝和造桥挖桥墩等，如发现第四纪地层断裂或错动现象，在地质学上叫“新构造运动”，这就要确定“新构造运动”的时间，如从其中找出旧石器文化遗物，就能帮助工程技术人员确定其发生时间，进而考虑坝的强度等工程质量问题。假如新构造运动发生在近期，表示地壳活动频繁，就要认真考虑改坝址或加强坝的质量，以免在工程建成后发生渗漏或坍方等问题。

旧石器考古研究与现实斗争也休戚相关。如：不少外国殖民主义者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利用我国科学暂时落后，史前考古材料奇缺的局面，不顾我国古代科学的伟大成就，特别是指南针、造纸、火药和印刷术四大发明的历史事实，竟高唱“中国文化西来”说。其意是：中国虽有高度发达的文明，但无古老的史前文化，这些高度发达的文化源自西方的史前文化，从而为其侵略中国提供所谓理论根据。本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我国史前文化的一系列重要发现，特别是周口店古遗址的发掘工作，迫使“西来说”者偃旗息鼓。但事情并不因此而结束，近来又有“西来说”、“南来说”，我们用丁村文化等新中国成立后新发现的资料予以批驳，这些说法又暂时消声匿迹，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各种奇谈怪论未必不会死灰复燃，因之，我们在考古方面仍须努力工作，以使用更丰富翔实的材料来回答种种问题。

由于旧石器文化研究的意义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认识，不仅考古学家、民族学家、历史学家、古人类学家和第四纪地质学家需要广泛地掌握旧石器文化资料，为自己的研究工作服务，而且有更多的考古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对旧石器考古的兴趣愈来愈浓，希望得到方法上的指导，但均感到有关参考书籍贫乏，到目前为止，在国内还没有一本单讲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书。在

这样的形势要求下，在诸师友的督促、鼓励和支持下，我斗胆一试，整理出这本小册子，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考虑到读者对象的不同，我的主观愿望是这本书尽可能地通俗，使对此有爱好者能读懂，在实际工作中能初步应用；对专业工作者又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此，在本书内容编排上大体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用比较通俗的文字，扼要地介绍我国旧石器考古简史和旧石器考古研究的基本方法。通过前者向读者介绍这一学科走过的曲折历程，表明它的发展与社会和社会制度休戚相关；后者将给旧石器考古爱好者提供从认识石器、调查、发掘、材料整理到最后写成简报全过程的主要做法的实际知识，以利开展工作。第二部分是对我国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期旧石器文化主要特点的综述和重点文化的介绍，给专业人员、大学的考古专业提供参考材料，希望起到半教科书的作用。即使是一般读者亦可从中了解我国旧石器文化研究的主要成果和现状，从而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第三部分通过对我国旧石器文化小结，扼要地说明文化与文化的创造者——人和其所处的自然界的联系，以其对我国旧石器文化有一个全面的、概括的了解。

本书所用的材料是全国老一辈旧石器考古学家（包括少数的外国已故的旧石器考古学家）和广大旧石器考古学者辛勤劳动的成果，在叙述某一时期文化时，对地点或材料的取舍，对原始技术的解释、各类工具的定义、一地点的文化特点及诸旧石器文化在时空上关系等方面，均依作者的拙见加以论述。由于资料和水平的限制，能否达到主观愿望，将受实践的检验。书中存在的错误和不当之处，也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1984年7月

第一章 中国旧石器文化研究简史

旧石器考古学，十九世纪初，主要在法国有许多人从事旧石器的寻找和著述，到上世纪中叶，这些远古的文化遗物打破宗教的偏见，得到学术界普遍的承认，自 1868 年法国人莫尔蒂耶（Gabriele de Mortillet）建立欧洲第一个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后，旧石器考古学成为考古学的一个独立分支，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在我国这门科学始于本世纪初，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 1920 年起（当然可上溯到更早一些时间）到 1929 年，主要工作是外国人做的，是我国旧石器考古研究的草创时期；第二个时期从 1929 年到 1948 年，以中国猿人文化为研究中心，初步建立起具有我国特点的旧石器考古学；第三个时期从 1949 年到现在，是我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发展时期，其中还可再分若干个阶段。

一、我国旧石器考古研究的草创时期

从 1840 年起，我国逐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些国家为了掠夺我国的物质资源和麻痹我国人民的精神，纷纷派

来科学家和传教士，其中有些人也从事古生物和古人类以及史前文化遗产的调查和研究。已知最早的有关记载是在1903年，德国古生物学家舒罗塞（M. Schlosser）教授记述了德国医生哈白勒（K. Haberer）博士从北京中药铺买到的龙骨中的一枚完全石化了的可能是人的左上第三臼齿。美国传教士埃德加（J. Edgar）是在我国从事野外采集史前遗物（包括旧石器在内）最早的人。据记载，他从1913年起到30年代止，在湖北和四川省的长江沿岸采集了不少的石器，其中有些具有旧石器风貌，但由于他缺乏专门的知识，因记录不详、地点不明或层位不清，致使他所采到的标本的科学价值大为失色。至于后来有人依这些资料，从部分标本的形态对比出发，由此得出结论，说在时代上它稍早于中国猿人文化，在文化上把它定名为“长江文化”，自然是缺乏根据，难以令人信服的。

我国有可靠的旧石器的发现始于1920年。法国天主教神甫、古生物学家桑志华（E. Licent）是本世纪初在天津创办的黄河、白河博物馆（也叫北疆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在他办馆的宗旨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在中国寻找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他在甘肃东部和陕西北部传教过程中，于1920年6月在甘肃省庆阳县的黄土层和黄土底部砾石层中发现了三件旧石器。依目前的分类，其一是多面体石核，另两件是刮削器。首次发现的材料虽然仅有三件标本，但意义重大，打破了自1882年以来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 Richthofen）提出来的我国北方不可能有旧石器的看法。

后来，桑志华和另一位法国神甫、古生物和史前学家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 p. ），于1922年7-10月在河套地区（现属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大沟湾一带）进行野外考察，采到了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在运可研究室进行修整中发现了一枚幼童的左上外侧门齿。这是在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有

可靠地点和层位的人类化石，人们通常把它叫做“河套人”。

1923年，桑志华和德日进对河套地区进行更广泛的调查。他们从包头出发，西行至磴口，折向南行抵达银川，由此过黄河至横城，在其附近开展调查工作，在横城以东25公里，当地叫水洞沟的地方发现了四处旧石器文化遗址，采到大量的旧石器、用火遗迹和少量的哺乳动物化石。在此地工作告一段落后，他们继续东行，在水洞沟东面约30公里的清水营，在与水洞沟含石器层位相当的地层中又找到了一些石器。接着，他们沿长城继续东行，行至陕西省靖边县的宁条梁折向北行，进入内蒙，再次在大沟湾一带萨拉乌河两岸开展调查和采掘古脊椎动物化石，同时发现了一些细小的石器。

桑志华和德日进在河套地区两年的工作，将所观察的地层资料，采到的哺乳动物化石、人化石和旧石器由桑志华、德日进、法国人类学家步尔(M. Boule)和旧石器考古学家步日耶(H. Breuil)分别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在1928年出版的《中国旧石器文化》(Le Paléolithique de la Chine)的专著中予以反映(法文本)。步日耶在研究水洞沟石器后得出结论：水洞沟的石器相当于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莫斯特文化(Mousterian)向旧石器时代晚期早一阶段的奥瑞纳文化(Aurignacian)过渡时期的文化。大约在1940年前后，裴文中教授将水洞沟和萨拉乌苏河诸地点发现的旧石器合在一起，统称为“河套文化”。

1929年，德日进和我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教授到山西省和陕西省北部及内蒙南部进行新生代地层的考察，同时在黄土层和黄土底部砾石层中采到属于七个地点的几十件石器。这次考察的成果，他们写了一本专著，名为《陕西西部、山西北部蓬蒂纪后黄土期前地层之观察》。在该书的最后一章里，对所发现的旧石器作了简要的记述。

历时 10 年的第一阶段旧石器研究，从无到有，发现了十多个地点，其中有 4 处可能归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其余则归旧石器时代晚期，更早的文化尚待认识中。

二、以中国猿人石器研究为中心的时期

据现有的记载，1929 年裴文中先生于下洞堆积中找到第一块石器，因此，以这一年作为我国旧石器研究史第二时期的开始。为使读者对中国猿人遗址的发现和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将其前这段时间的工作历史也加以扼要的回顾。

周口店中国猿人遗址（从 1929 年起也叫周口店第一地点）最先认识它的科学价值的是瑞典人安特生¹⁾ (J. Andersson)，他曾于 1918 年到过周口店，在当地人叫鸡骨山的地方，采到一批小哺乳动物化石，于是引起他对周口店地区考察的兴趣。1921 年夏季，安特生约请美国古生物学家格兰阶 (W. Granger) 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斯坦斯基 (O. Zdansky) 同往周口店考察。他们先到鸡骨山采化石，在这过程中，当地烧石灰工人告诉他们，在此北面一公里的地方有座龙骨山，那里有许多大的龙骨²⁾。安特生等人闻讯后，在烧石灰工人带领下，前往考察。他们来到了龙骨山，不仅从中发现化石，而且在观察洞穴堆积中，安特生在含化石的角砾岩中发现了石英片。由于石灰岩洞穴本身不可能有石英片，他认识到这是外来的岩石，由此他颇有见解地预测：“这里有古人类，现在让我们全力以赴地去找他吧”！³⁾ 他把龙骨山编为他的野外地点的第 53 地点。由安特生这几句简单的话语，可以看出，他已初步意识到周口店地点的科学价值了。

1) 他当时是北洋政府聘请的农矿部矿政顾问。

2) 龙骨是群众的俗称，是一味中药，实际上是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

3) 见《中国原人史要》一书的第 6 页。

这次考察后不久，斯坦斯基被聘请去周口店发掘哺乳动物化石。1921年发掘工作仅进行了几个星期，发掘部位是由现今群众称之为猿人洞（即龙骨山，也就是解放后称之为中国猿人遗址）北壁人工开的洞口处向里发掘，其层位相当于后来地质分层的第四层下部。1923年发掘工作仍由斯坦斯基主持，在发掘中发现了一枚磨蚀严重的人的下臼齿，他当时就认出是人的。在把发掘所采的化石运往瑞典乌布萨拉研究室修理时，从中找到了另一枚未磨耗的人的下前臼齿，后来这两枚人牙齿由斯坦斯基作了记述，鉴定为人属（*Homo* sp.）(Zdansky, 1927)。这就是龙骨山发现的最早的人化石，现由曾参加过周口店发掘工作的，瑞典古生物学家步林（B. Bohlin）先生保管着。

周口店发现人化石一经公诸于世，引起了科学家们的重视。当时我国外侵内患，灾难深重，北洋军阀政府根本不关心科学，周口店发掘经费无法解决。后经科学家们多方设法，几经协商，周口店的研究工作由当时的地质调查所与协和医学院解剖系合作，所需经费由美国勒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地质调查所亦提供部分经费，并拟定了1927—1928年为期两年的正式发掘计划。发掘工作由协和医学院解剖系主任、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D. Black）负责。

1927年春季，周口店开始正式发掘。中国方面派地质学家李捷先生参与工作，并聘请瑞典古生物学家步林博士参加发掘。当年在主堆积西侧打了一条探沟，发现了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和一枚保存完好的人的左下第一臼齿化石等珍贵材料。步达生依这枚人的牙齿形态，经研究，认为是代表一种新的原始人类，他接受了当时在北大任教的古生物学家葛利普（A. Garbau）的建议，起了一个新的种属名称，叫做中国猿人北京种（*Sinanthropus pekinensis*）。自此之后，才有中国猿人这一名称见于国内学术刊物和报纸上。

1928年的发掘区，在上一年发掘区之东边。我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刚从德国学成回国，参加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并作为中国方面的代表。年青的地质古生物学者裴文中也去周口店工作。

这一年的发掘工作收获甚丰，除发现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外，还找到许多中国猿人化石，在猿人A地¹⁾找到下颌骨1件、牙齿4枚；在猿人A地东侧稍高处发现了猿人顶骨、额骨、肱骨、月骨和下颌骨（残）各一件，还找到下颌骨残片5件和牙齿8枚，这里称为猿人B地。

在1927—1928年的发掘中，工作人员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找人类化石上，尽管在发掘的堆积物中存在石英和燧石等石器以及用火痕迹²⁾但均被忽视。

1929年，由于德日进³⁾和杨钟健去陕西和山西考察新生代地层，周口店发掘工作由裴文中主持。他在自学考古知识和德日进的启迪下，在发掘工作中开始注意寻觅中国猿人的文化遗物。

这一年不仅以发现中国猿人第一头盖骨而载入史册，而且，在文物遗物研究方面也揭开序幕，裴文中从堆积中，收集到许多有颜色的碎骨、鹿角，这些呈黑色、灰色、蓝绿色的标本在当时只当作可能是用火遗迹而被保存起来。裴文中还在下洞堆积中找到一件有打击痕迹的石英器。眼看中国猿人文化的庐山真面目就要被有识之士所识破，但是，俗话说，好事多磨，世上无直路，如此重要的发现并未引起当时负责人的重视，步达生在记述中国猿人第一头盖骨中反而说“尽管检查了几千立方米的堆积，既未发现任何性质的石器和任何性质的用火遗迹”（Black 1931, p. 208）。看来一场中国猿人有没有文化遗物的

1) 依猿人化石发现地的前后用英文字母依序编号。

2) 当年发掘第四层，即现称大灰层。步林曾从中数出一百多个薄层。

3) 邀请他作为周口店工作的顾问，参与工作。

争论，随着周口店工作的发展，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1930年，发掘工作在周口店第一地点继续进行，采到更多的有色骨片和鹿角。在发掘下洞（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于此，编号为猿人E地）时，采到了几件人工打击痕迹清楚的石器，现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尚有四件标本，这是最早发现的、标本上写有发现年份的中国猿人石器。

这一年的冬天，德日进将从周口店第一地点的有色骨片和鹿角带到巴黎与西欧史前遗址中可靠用火遗迹的资料进行对比，从宏观上判断，这些疑为用火遗迹的骨片和鹿角与西欧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烧骨和烧过的鹿角非常相象，初步判断它们是燃烧的结果。为慎重起见，德日进请人作了化学成分的分析，用不同方法分析的结果是：其中的黑色物质并非铁锰质等有色金属的污染，而是含有游离碳。这个分析结果表明，这些标本是燃烧后变色的，是用火的证据，从而基本上确定中国猿人是懂得用火的古人类。

1931年春季开始，在周口店第一地点的鸽子堂部分发掘，在几个层位发现石英片，其中以石英Ⅱ层最有意义，在这里不仅在54平方米面积内发现了几千件石英片和其他岩石做的石器，还发现地面被烧硬的火堆遗存和其他丰富的用火遗迹：烧骨、烧石和灰烬等。其中的灰土（当时称为黑色物质）再次请协和医学院进行化学分析，所得的结果与在巴黎分析的结果相同。至此，中国猿人懂得用火完全被肯定下来。

石器存在与否的确定比用火遗迹的确认稍复杂一些，关键是原料对人工打击痕迹的影响问题。当时发现大量的石英片，其一是石英片上人工痕迹比较难辨认；其二，中国猿人打击石英用了一种特殊的方法，现在我们叫做砸击法，它所产生的石片与当时教科书上所叙述的石片（多指用锤击法生产的石片）的特点完全不同，因之部分周口店工作人员在1931年夏天以前，

对这些标本是否是人工打击的持怀疑态度。

裴文中先生为了弄清这些标本的生产方法和说服持怀疑的同事，做了大量的打击石器的试验，证明遗址里发现的石器都可由人工打击试验将它再造出来，并指出人工打击的石器与自然碎石的不同。1931年法国史前学会会长、世界公认的旧石器文化研究权威、法国教授步日耶访问周口店，充分肯定了裴文中的研究成果，打消了一些同事的疑虑。于是把周口店新的重要成果——石器和用火遗迹的存在公诸于众，石器由裴文中撰稿、用火遗迹由步达生著文同时发表在这一年出版的地质学会志上。从此，周口店第一地点不仅仅是一所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和人类化石的地点，而是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远古人类的文化宝库。

由于周口店第一地点已是公认的史前遗址，因之发掘方法也作相应的改变，从1932年起，改变以往的古生物发掘方法，改为打探沟和打格分方相结合的发掘方法。具体做法是先挖一条长3米、宽1.5米、深5米的探沟，在搞清探沟内地层的情况下，再分方格，每方格为 3×3 平方米，按方格进行发掘。

1932年德日进和裴文中合作，把历年积累起来的（包括从1927—1928年发掘中未注意到而再从掘出来的堆积中回收来的石器）中国猿人石器作了初步的系统研究，发表了重要的论文。在那篇论文中，他们指出了中国猿人石器的一些特点，如：在这些石器中，没有手斧，粗大的砾石石器与似细石器的石器共存；对当时人打制石器作了估计，认为中国猿人制造石器已懂得为适应几种不同的用途，在选材、打击和修整等方面采用几种不同的加工方法，但对原料的依赖性很大，即石料优者石器亦规整，石料劣者，器形不整，以至人工痕迹难辨。德日进和裴文中还看出中国猿人石器的发展趋势。他们把中国猿人遗址发现的石器，依地层顺序分成A、B、C三个文化带，C带指

石英 II 层以下的石器，石器粗大，砾石工具较多，A 带指四层以上的石器，工具细小，制作精致。这一工作为中国猿人石器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这些论点对中国猿人石器的研究是很有影响的。

1933 年同时在周口店地区三个含石器的地点进行发掘，第一地点工作做的不多，这一年冬还对第一地点南面约一公里第十三地点进行发掘，但发掘的重点则放在山顶洞遗址。

山顶洞遗址是 1930 年清山找界中发现的。由于 1929 年周口店第一地点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中国猿人头盖骨，当时在周口店工作的人都希望搞清猿人洞的范围，当时猿人洞北壁已清楚，所需要搞清的是南界，于是在 1930 年把南部草木铲尽，挖沟找界，在这过程中发现了山顶洞人遗址，因其堆积与中国猿人堆积迥然相异，并未引起主持人的重视，经裴文中先生几次力争，才勉强同意发掘，被定为 1933 年工作重点。考虑到山顶洞遗址的实际情况，发掘方法更为细致，每方为 1×1 米，每半米为一水平层。山顶洞发掘工作自 1933 年起到 1934 年第一季度止，从中不仅发现了少量的石器、骨器和大量的装饰品，而且在我国首次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墓葬。事实证明它是极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为了解这个阶段人类的意识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1933 年在周口店工作中，还有一件重要的工作，即出版了第一本综合性研究报告。这本名为《中国原人史要》(Fossil Man in China) 的书是用英文写的，另有中文节要，扼要地介绍了周口店的研究史、地层、古生物、人化石和石器的主要研究成果，并与华北的已知旧石器地点从地层上作了对比，简略地提到当时还没有统一意见的中国猿人骨器问题，并提出解决此问题的途径。

1934 年除发掘上一年未完的山顶洞遗址和周口店第 13 地点

外，主要发掘工作转向第一地点，开始新的发掘，即从顶部向下发掘。到这一年周口店发掘工作始行规范化，即用打格分方的发掘方法，每方为 2×2 米，每厚 1 米为一水平层，每件标本均标上发掘年份、工作日累计数、方格号和水平层号，使你拿到一件石器即能推算出发现的年、月、日，及其在遗址内的水平和垂直的位置。这种细致的发掘方法和记录方法延用至今。同年对周口店第十五地点进行发掘。

1935 年，因裴文中赴法深造，从法国著名的史前学家步日耶教授专攻旧石器考古学，周口店发掘工作由贾兰坡先生主持。贾先生自 1931 年参加周口店工作以来，协助裴文中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本年对第十五地点继续进行发掘。两年的发掘，获得丰富的石器，成为周口店地区另一重要的旧石器文化遗址。

1936 年发掘工作仍由贾兰坡主持，他在第 25 水平层中发现了三具完整的中国猿人头盖骨。这一年还发现了大量的石器，取得丰硕的成果。

1937 年继续发掘第一地点，主要发掘层位是第十和第十一层，发现了少量石器和人化石，同时发掘第四地点，该地点在猿人洞南 70 米处。“七·七”事变，日寇侵华，全国人民掀起抗日救亡运动，周口店发掘工作被迫中断。

这里附带提一下，除周口店工作外，步日耶于 1935 年二次访华，据载¹⁾ 在旅顺和大连的公路旁的在红色土层中找到两件石片。依作者所见标本和实地考察，石片属人工打制石片无疑，地层似须再研究。

1937 年“七·七”事变后不久，裴文中在法国学成后回国，受命留守北平。从 1938 年到 1941 年底珍珠港事变前，主要是做室内研究工作，发表了有关周口店的多本研究专著和论文，

1) 这两件标本由德日进作了记述，见《中国早期人类》（英文）的第 62 页。

如《山顶洞人文化》（裴文中，1939）、《中国猿人肢骨的研究》（魏敦瑞，1941）和《中国早期人类》（德日进，1941）等，为我国古人类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珍珠港事变发生前后，周口店从1927年以来发现的全部中国猿人化石、山顶洞人化石和一些灵长类化石在几个美国人手中弄得下落不明，至今仍未能弄得水落石出。

从抗战到我国大陆解放前夕，这段时间我国旧石器文化野外工作处于停顿状态，未发现一块人类化石和一件旧石器或其他任何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而此间，周口店的工作人员或为周口店工作牺牲了生命，或自谋生路，珍珠港事变后，彻底解散，留守负责的裴文中教授也只好应聘去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系统讲授史前考古学，著有《史前时期之研究》一书（1948），中多新见，培养了一些史前考古人材，为我国史前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我国旧石器考古学大发展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旧石器文化研究，也和其他学科一样，得到大的发展，但发展仍然是曲折的，地区的发展也很不平衡，但毕竟脱了解放前只限于几个地区的局面，使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都有人类化石或旧石器的发现，或兼而有之，并拥有多处地点。从总的来看，在建国后的30多年里，除了1967—1970年期间，因特殊原因无任何发现外，其余时间或多或少均有发现，从工作性质和范围来看，大体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国后的十年，恢复周口店工作和配合基本建设开展旧石器文化考察为主要任务；第二阶段是1960—1966年有重点地开展新区域考察工作；第三阶段从1971到目前，面向全国和地方旧石器考古人材成长阶段。现将各阶段主要成果简单地加以介绍。

（一）建国后首先抓周口店恢复工作并密切配合基建工

作。

周口店工作停顿近十二年，当北京一解放，当时华北人民政府就十分重视周口店工作，组织队伍，拨专款恢复周口店发掘，整理标本，修建了我国第一座古人类遗址陈列馆和其他工作必须的建筑设施，还专门为周口店修筑了从北京广安门到周口店的京周公路。

在1954年陈列馆落成之时，恰逢中国猿人第一头盖骨发现25周年，召开了隆重的科学讨论会以纪念这个有意义的发现。在会上许多专家报告了中国猿人化石及其文化等新的研究成果，新发现的材料也在会上作了介绍。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我国古人类学研究继往开来的会议。在会后拟订了中国猿人石器综合研究计划，出版这次会议的论文集，题为《中国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于1955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1956年，贾兰坡发表了《对中国猿人石器的新看法》一文，他提出中国猿人曾用三种方法：砸击法、锤击法和碰砧法进行打片的观点。同时还对中国猿人石器修理方法发表了新看法，他认为中国猿人不仅用锤击法，而且还用碰砧法。他还认为中国猿人石器有明显的进步性，他指出：“中国猿人石器不但有一定的打片方法和修整方法而且还有一定的类型”；“在工具上已有一定的分工——刮削器不能用于砍伐，尖状器也不能用于锤砸”（贾，1956,8页）。这些见解引起了旧石器文化研究者普遍的重视。

从1958年开始，全面整理历年发掘所得的中国猿人石器，在此基础上，对石器进行分类研究，于这一年底，写出了中国猿人石器分类研究的初稿。由于时间仓促和其他原因，其学术水平是可想而知的。为了提高水平，大约在1959年初，组织了一个专业小组，在裴文中和贾兰坡教授指导下，其成员有邱中郎、张森水、戴尔俭和李炎贤。他们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继续